

【刊首语】

专博兼备方可创新异

任玉岭

当今世界的竞争焦点在创新,创新的动力和资源在人才。为了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增强培养创新人才的紧迫感。

曾有一些大学专家和学者撰文称新中国成立近70年鲜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说明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有问题,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他们认为,中国要培养创新人才,就要走自由化道路,甚至举例说不需要强调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我认为,讲这些话的专家们缺乏认识问题的历史观、实践观,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因此,这些结论和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的近代教育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但是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应该说既有中华民族的特征,也有中国自身的优越性。远在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因流亡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办学仅8年,不仅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袁家骝这样举世闻名的学界大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还培养出近30名院士和一大批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解放后,更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于“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的大学生,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两弹一星”和中国很多个第一的实现作出了贡献,而且挑起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的重担。不少国家领导人、省长、部长、市长、县长和各行各业的工程总指挥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抗疫英雄钟南山等都是由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培养的。

70年前,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我们用的灯是洋灯,吸的烟是洋烟,穿的布是洋布,甚至火柴都不会生产,广大农村还要用火镰撞击火石取火。而今,中国制造业已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超高压输电、高铁、千万吨炼油装备、超临界火电机组、核电生产装备制造等都已走在世界前列,还有数量众多的超高、超大桥梁及北斗导航、可燃冰开采、万米深海潜水等也都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些装备的设计、制造、操作及管理人才,主要还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因此,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的教育和中国人才培养

的模式和要求。

谈到诺贝尔奖过少的话题,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基础科学投入不足有关系,科技成果的产出同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直接相关联。过去,中国因经济总量低、财政收入少,科技投入极低,特别是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更是杯水车薪。中国的科技投入开始加大是由习近平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开始的,近七八年,因投入加大及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及海归人才数量的快速增加,已使很多前述的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投入向基础研究的倾斜及人才井喷的到来,诺贝尔奖也一定会更多地走进中国。

据此,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上既要弘扬长期积累的好经验,又要对出现和存在的问题搞好创新和改革。总体来看,夯实基础、学好专业是中国教育的长项,而课外阅读少和活动半径小,则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因此,创新人才的培养一定要立足补上短板,做到专博兼备。为此,需做好以下六方面的改革。

一是改变过去“分槽喂养”、一切从优的培养模式,切记“温室中培养不出参天大树”,“猛将必发于卒伍”。二是对各级学校的教材删繁就简,减轻学生负担,做到中小学宽松、大学从严。三是引导学生扩大社会活动半径,要让学生更多参加劳动、旅游、考察、悬谈、参观等。四是加强中国语言和外国语的学习。创新,需要好的思维和表达能力,更需要站在本行业的世界制高点上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如果本国语言和外语跟不上,就会盲人骑瞎马。五是让学生学会运用辩证法,做到在观察事物时既看树木又看森林;既会运用必然规律又能抓住偶然现象;既要重视读书又不能完全信书。六是要按习近平主席所讲,“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努力弘扬正能量,爱党、爱国、爱人民,要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不畏艰难险阻创新奋斗的品德和精神。

(任玉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